

抒怀

# 遍插水稻祭袁公

□ 陈赫

少年时代,我居住在南方的一隅山村。那时候,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靠着几亩土地,而水稻则是土地上绝对的主角。

那是记忆里最深刻的一段时光。每逢四月的春风吹拂大地,父亲就会哼着歌谣,带着满脸的笑容去田间插秧,而我在他身后永远的小跟班。父亲戴着草帽弯着腰,卷着裤腿站在刚能淹没小腿肚的水田里。水田的底层是经过父亲翻了两到三遍的土,然后蓄上水就泡成泥了。他干净利落地拿起抛入水田的小捆秧苗,解开,左手拿着一把秧苗,右手迅速地插着秧。

父亲一边插一边往后退,双脚深陷在淤泥里,虽然辛苦,但他却洋溢着更多的幸福。在间歇的时候,父亲拿着手里的秧苗问我:“你知道我们今天能够不再挨饿,最需要感谢谁吗?”我摇摇头表示不知。父亲提高了声音说道:“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973年,袁隆平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从1976年开始,全国推行杂交水稻,到1998年,

全国一半的稻田都在种杂交水稻。”听着父亲自豪且感恩的话语,我深受触动。从那天起,站在水田的秧苗中间,我永远地记住了袁隆平爷爷,这个伟大的名字。

时间一天天过去,绿油油的稻谷开始昂首挺胸,颇有少年狂气,随着风的指挥左右摇摆;它曾经历过阳光雨露,也曾经历过暴风骤雨,但柔软的茎却未被折断。待秋天来到,它饱含稻穗的头就悄然低下,那里面充满了智慧和感悟。

不止水稻在不停地生长,我也在一天天地长大。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受袁爷爷的影响,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农业系。大学毕业后,我又毫不犹豫地回到山村,回到了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之上,开始和水稻打交道。

2021年5月22日,我忙完回到家中。父亲红着眼睛从里屋走了出来,他一看到我,眼泪瞬间奔涌不止。我急忙问起父亲:“爸,怎么了?”父亲泣不成声地说道:“走了,袁爷爷走了!”刹那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缓缓拿起手机,



铺天盖地的新闻推送而来:“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获悉,‘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5月22日13点07分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

良久之后,我从瘫坐的地上用尽全力站了起来。我对父亲说:“爸,走,咱们拿上秧苗,去地里插上,以此祭奠那个心里只有水稻的老人吧。”

田野上微风拂面,空气格外清新,我和父亲一口气把所有的秧苗插遍了整个田地,任凭汗水或者泪水,顺着脸颊肆无忌惮地流下,直到累到无法站立。我指着天空对父亲说道:“爸,可能天堂也需要粮食了吧,所以袁爷爷才带着种子,去了远方!”

思想

三月的一个下午,与一位本土作家喝茶闲聊,他问我今年是否有计划申报国家某协会。我闪烁其词,没有当场作答。次日,省城一位文友来访,也聊到了同样的话题。

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打消念头,因为凭目前的创作成果,我还达不到协会要求。

时间蔓延的速度真的好快,似乎在倏忽之间,我已业余创作三十余年。三四百篇文章,七八十万字的公开发表之作,以及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的三部作品集,都是我利用节假日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夜深人静时,每当看到家里书架上那一摞一摞的样报样刊,说实在话,我有时竟为自己而感动,我觉得我这三十多年没有虚度光阴。

我当然清楚,这是孤芳自赏。我的差距是很明显的,写的东西固然不少,但上档次的不多;发表的文章虽然不少,但上得多的是地市级党报或行业报刊的副刊。这些年,我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每每写出了东西,只要发表了,就心满意足了。内心深处,我是很尊重地市报或行业报,它们的发行区域可能受限,但它们并不缺读者,更不缺撰稿人,为基层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成长平台。我便是其中的一位幸运者,遇到了那么多好编辑,是他们的抬爱让我的心血变成了铅字,我从心底感激他们。

但规则就是规则,你不符合条件就得继续修炼,否则就有沽名钓誉之嫌。

不知怎的,人一旦摒弃了某种欲望,反倒变得轻松起来。想来创作毕竟不是我的主业,我投身创作完全是一种心灵的驱使,与能否戴上一顶什么帽子实无太大关系,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成果。

这也不禁让我想起了王维的一句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想,写作既然是我几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弃的爱好,我还得坚持下去,努力“行到水穷处”。至于最终结果如何,则不必太在意,保持“坐看云起时”的胸襟才是最重要的。

坐看云起  
安化县教育局 廖双初

忆情

武冈市育英中学  
曾彩霞

那时候,我们没有学习的禁锢,没有电视、手机的诱惑,看电影就成了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最快乐的事情。

记得一次看电影,名字叫《渡江侦察记》,看过好几回了,可我们还是兴趣盎然,还好,这次不远,电影就在河对岸的山坡上放映。我和伙伴动身的时候,比我小几岁的妹妹也要去,说不带她去就要告诉父母。我们是瞒着父

母去的,拿她也没办法,只好带上她。一艘小船,挤满了人,划船的也只是一个年龄较大的伙伴。为了安全,我不让妹妹上船,将她留在岸上,哄她说我到了那边再划船来接她。她也听我的话,答应了。

就这样我一个人随伙伴们过去了。那晚的月色很好,透过月亮的光辉,我能清楚地看见妹妹,好像在做“吃石子”的游戏。我就不打算再过去接她了。

心里终究有着妹妹的挂碍,电影的情节完全没了滋味,我总是心神不宁地时常跑到岸边观望。当我又一次走到岸边的时候,听得见她已经在大声哭喊了,好像还走到了河岸边沿,吓得我大声喊:“妹妹,我来了!”飞快地走到码头,跳上船,捞起竹篙就撑。那时我也不过十岁,力气当然不大,没撑几下船头就偏了向,不朝着对岸而朝着下游前行,无论我怎样使劲,总是扭不转。到了急流处,船就打直了。我更无能为力,只能任其顺水漂流,任其越飘越快,越飘越快,只是一个劲地说“糟糕,糟糕”。

船飘下了好远,岸边的人看到后,有的吓得大叫,有的喊快把船横过来,有的教我怎么撑船,那些声音有高有低,有男有女,此起彼伏,俨然将电影搬到了岸边。在这些人的激励下,我在船飘到水不太急的地方时,鼓起劲,撑篙,撑篙!终于掉转头,再使劲,将船撑到了对岸的停靠地点,我欢快地大声喊:“胜利了,胜利了!”

嘿,我很自豪了,觉得是上演了一部现实版的《渡江记》。

可船还没停好,却看见妹妹已经走到沙滩边的水里,还在继续往前走!

我心里说,谢天谢地,幸好我过来了!

回到家,自然又受到母亲的一顿“犒赏”。

传承



印象

张成林/摄

随笔

## 行走在家访途中

怀化市洪江区东方红小学 朱颖

小向老师是我们学校这个学期新来的一名青年教师,这个学期担任班主任工作,每天忙得焦头烂额。接到她的邀约后,我非常乐意地陪同她走进了几个孩子的家中。

我们去的第一家是住在偏远的洪高村部的小贺家中。小贺高高帅帅的,在班上是一个有组织力的孩子,大家都比较听他的话。走进小贺家中,他的外公外婆都很热情,通过交流才知道,他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家里有外公外婆和两个比他小很多的弟弟妹妹。老人白天奔波和耕耘在农事上,晚上回来管三个小孩的生活,非常辛苦。外婆说小贺独自一人守着自家那栋房子,不愿意和他们一起住。小向老师马上敏感地问:“那他一个人在家,不孤单吗?有手机吗?”外婆显然对我们的问话觉得诧异,平常地回答:“那有手机陪着不热闹点啊?一个孩子家的,你难道让他一个人黑灯瞎火

的啥也没有……”当我们再次普及手机对孩子的影响和小孩子的睡眠管理等相关知识时,老人家急不可耐地端出自家的水果、零食,随时准备打断我们的话,好像我们说的、提出的都是极不现实、极不人性的要求。

我和小向老师跟小贺聊了很久很久,我们一起走在乡村的田坎上,小向老师跟他聊山外的世界,聊书里的世界,聊班上的同学,表扬他的时候,他腼腆地笑笑。在聊到他喜欢的明星时,他才恢复了孩子本有的天真,抓住这个机会,我们跟他谈易烱千玺的成长故事。他听得很入迷,还时不时插几个问题,当我鼓励他说:其实只要你肯努力,能自律,放下手机,好好学习,你也能成为像易烱千玺那样的人。他腼腆地朝我们笑笑,不做声。

从小贺家离开的时候,天已断黑,他目送我们的车子驶过那条窄窄的乡间小道,他一直在朝车子里的我



们使劲地挥手,并往前跟着跑。我索性把车停下,打开车窗的那一瞬间,我却突然不知该说什么作为今天家访的结束语。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无力。

思想不是一两次家访就能改变的。通过这次小贺家之行,我有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想法和打算——下次,当我们老师走进留守儿童家中,与其试图改变家长或是说服家长,不如停下来,把孩子拉到一边,亲切地问问他需要什么,他快不快乐,或者就像妈妈一样,陪在他身边,安静地陪他看书、陪他写作业。或者,像个朋友一样,陪他聊聊天,听他讲少男少女的心事。让他觉得,哦,原来在我身边,有老师是懂我的那个人。